

黨史學習參攷文件

(第一輯)

中國共產黨天津市委員會宣傳部印

一九五三年四月

目 錄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關係·····	李琦（一）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中國工人階級發展的情況·····	劉立凱、王真（一三）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形成·····	于晉（二八）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以前的孫中山和國民黨·····	黎澍（四四）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人運動（一、二、三）·····	劉立凱、王真（六四）
·····	·····
讀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李琪（九二）
讀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的四篇著作·····	李達（一〇六）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簡況·····	裴桐（一二七）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關係

李琪

一 戰後國際關係的基本特徵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關係，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當時的世界已不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的世界了，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廣大土地上創立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從此有了兩個世界：社會主義的新世界和資本主義的舊世界；有了兩個陣營：以蘇聯爲首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陣營，和以美、英等爲首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反革命的陣營。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動搖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整個體系，開始了資本主義總危機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在戰後更加尖銳化起來。世界分裂爲兩個世界，兩個陣營，乃是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本特徵，同時也是戰後國際關係的基本特徵。

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也起了根本的變化。它不再是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而成爲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成爲世界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偉大同盟軍。因而這種革命，就脫離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成爲新範疇的民主主義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十月革命把西方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聯結起

來，以社會主義蘇聯爲中心，組成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的統一革命戰線去反對帝國主義。所以，十月革命不僅開闢了帝國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而且開闢了世界各被壓迫民族與無產階級聯盟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時代。

中國從「五四」運動開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後世界歷史的新的情況下進行的。中國革命從此成爲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陣營一個偉大的組成部分。

二 巴黎和會與中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奧帝國主義集團失敗而告結束。由於四年殘酷戰爭的破壞，使歐洲差不多所有國家的工業、農業和財政都陷入於極度紊亂和破產的境地。大批工廠被毀壞，許多城市和鄉村變爲廢墟，人民生活非常痛苦，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達到了極點。特別由於十月革命的直接影響，這時在歐洲以及東方許多被壓迫民族國家裏，都在發生和醞釀革命，掀起廣大人民的反帝運動，形成戰後世界革命第一個高潮。比較大的如一九一八年十月發生芬蘭的無產階級革命；同年十一月德、奧爆發革命，推翻了半封建的君主專制；一九一九年三月發生了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四月在德國巴伐利亞省也建立了蘇維埃政權；此外在東方被壓迫民族國家裏如中國、印度、波斯、朝鮮、荷屬東印度等，也都發生和醞釀革命。所有這些，都標誌着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增長和加深，使戰後資產階級在世界上的統治面臨一個非常嚴重的局勢。

爲了宰割戰敗國和重新分配殖民地及劃分勢力範圍，爲了反對正在發展着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以鞏固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戰勝的帝國主義集團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

日在巴黎召開了所謂「和平會議」。會議是在美國主持下舉行的。以美國總統威爾遜和美國國務卿藍辛與英、法、意、日四國的總理及外長組成「最高和平會議」或「十人會議」爲和會的最高決策機關。由於美日的矛盾和衝突（主要在爭奪中國問題上），三月間「最高和平會議」改由美英法意四國首領參加。到四月中旬，意大利總代表奧蘭多因威爾遜沒有滿足他的關於阜姆港問題的要求，離開巴黎，此後和會重要問題即完全由美、英、法三國秘密地舉行會議來解決。

當時中國有許多對和會有一種天真的幻想。他們以爲，協約國的勝利可以使中國解脫帝國主義的束縛和壓迫；他們以爲，在大戰後不平等條約就會修改和廢除。他們以爲，中國既然是戰勝國之一，當然就有充分權利在巴黎和會上要求取消德國在山東的各種權利，並收回原爲德國控制的膠濟路及青島（在大戰中已爲日本所強佔），要求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各種特權，而且可以達到目的。在巴黎和會之前，即在一九一八年一月間，美國總統威爾遜即宣佈其和平條件十四條，其中第十一條說，「扶助弱小民族」。威爾遜並曾聲言：「一俟國際聯盟機關成立，即將竭力贊助中國由半自主的國家變爲真正獨立的國家。」這種美麗的語言更增加了中國這一部分人的幻想。然而，事實却完全相反，威爾遜的諾言，只是對中國人民的一種欺騙。巴黎和會不過是帝國主義者的分贓會議。那些把中國的獨立解放的希望寄託在帝國主義身上的人們，發現他們只不過是做了一場夢。

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西園寺和牧野即向和會提出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國的山東的一切權利的要求。中國代表是陸徵祥和王正廷等。他們向和會提出了以下的七項希望條件：（一）希望列強放棄在中國勢力範圍；（二）撤退各國駐華軍隊；（三）撤銷各國在華的郵政電報；（四）取消領事裁判權；（五）歸還租借地；（六）歸還租界；（七）關稅自主。此外，並提出了取消二十一條的陳述書及請

求歸還大戰期間在山東被日本奪去的各種權利。對於中國代表的這些提案，帝國主義強盜們根本不願理睬，結果，除了山東問題外，其他各點都沒有能提到大會上去討論。這些提案送到「最高和平會議」時，就被打回來了，帝國主義者說「二十一條」的問題不在和會討論範圍之內，至於「希望條件」，現在還不是希望時候，等將來再說。

中國的軍閥政府的代表本來不過是爲了敷衍國內的民意，所以才用那樣軟弱的口氣向帝國主義強盜提出那一串「希望」。看到帝國主義不願討論這些問題，也就不再堅持，只是向和會提出德國戰前在山東的特權問題，要求把它直接交還給中國。但就是這一點要求，也被拒絕了。當時帝國主義強盜們的共同利益，是如何鎮壓正在發展着的世界革命運動，以鞏固他們在戰後的統治。巴黎和會除了分贓的任務外，還有一個使命，就是團聚各帝國主義的力量，組成一條從波羅的海到堪察加半島的反對俄國蘇維埃和全世界革命運動的帝國主義戰線。而日本在美、英帝國主義者眼中看來，正是他們在東方反對俄國革命和鎮壓東方被壓迫民族運動的有力鷹犬；加以事前英法爲了拉攏日本反對德國，已與日本訂有密約，承認日本攫奪山東的權利，因而在和會上英法與日本勾結在一起，支持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的要求。美國雖與日本在爭奪中國和太平洋霸權上存在有很大的矛盾，但由於上述原因，這時也不能與英日過於衝突，使分贓會議中途散夥，而分裂了反革命的陣營。四月間意大利代表退出和會後，日本乘機也以退出和會相要挾，於是，和會乃按照日本的要求，答應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完全由日本繼承，並在對德和約一五六——一五八三條中作了明文規定。所謂山東問題，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就這樣的遭受了完全的失敗。

中國從世界大戰中，不僅不能收回一些權利，而且在帝國主義分贓的宴會上反喪失了更多的權

利。事情是非常的明白，原來巴黎和會，不僅是戰勝國掠奪戰敗國的會議，而且是帝國主義者進一步奴役中國的會議。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後，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而成爲中國當時歷史條件發展已成熟了的「五四」運動爆發的導火線。當時北京政府代表順從帝國主義主子的意旨，本已準備去簽訂這種恥辱的條約，但由於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才不得不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三 俄國反武裝干涉的勝利和中蘇關係的發展

帝國主義爲了抵抗戰後世界革命的形勢，首先就集中力量反對俄國革命，反對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

在帝國主義者看來，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是對他們的最大威脅。因爲它不僅是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革命的旗幟，而且也是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革命的根據地，是全世界勞動人民的祖國。還在大戰尚未結束的時候，帝國主義就對俄國舉行了進攻。首先是德帝國主義，接着就是美、英、法、日、意等十四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國家實行武裝干涉，扶植俄國地主資本家及國內一切反革命分子，內外夾擊，企圖在蘇維埃政權還未鞏固的時候就把它推翻，以便在俄國恢復資產階級政權和資本主義制度。但當時大戰還在進行，帝國主義還不可能抽調很多的軍隊去進攻蘇俄。一九一八年冬，協約國既將德、奧打敗，大戰結束，於是就決定調大批軍隊來進攻蘇維埃國家，武裝干涉者曾佔領了俄國廣大的領土，到處屠殺工農，恢復地主資本家的政權，同時宣佈對俄國實行封鎖，截斷俄國同外界來往的一切海路及其他交通道路，年青的蘇維埃國家因此遭受非常大的困難。然而在列寧斯大林、斯大林的英明領導下，在英勇的紅軍和蘇俄人民堅決鬥爭下，經過數年的血戰，到一九二〇年底，就已基

本上消滅了進攻的敵人，而獲得了決定的勝利。到一九二二年時，日本帝國主義強盜也被最後驅逐出西伯利亞。這樣，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第一次武裝進攻，就以完全失敗而告終結。

蘇俄反武裝干涉的勝利，具有着重要的歷史意義，它不僅是蘇維埃國家的勝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勝利，它爲全世界革命陣營保存了根據地，並創造了在這廣大國土上開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有利條件。

從一九二一年起，蘇俄就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建設的時期，全國人民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大力從事建設，至一九二四——二五年的經濟年度時，農業即已接近到戰前的規模，達到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八十七。一九二五年時，工業已達到戰前產量的四分之三。一九二六年時，開始了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工作。一九二七年蘇聯的工業產量就已經達到了戰前的水平，農業產量則已超過了戰前的水平。蘇維埃國家的鞏固和壯大，大大地推動和幫助了世界革命的發展。特別是推動和幫助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十月革命對於中國革命最重要的影響就是使中國人認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人民獲得革命的正确理論，從此中國革命面貌爲之一新。毛主席說：「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論人民民主專政」）

十月革命勝利後第二天，蘇俄政府就發表了有名的「和平法令」，向全世界各民族提議建立真正永久的和平，反對民族壓迫，宣佈帝俄政府及臨時政府和外國訂立的一切秘密條約與壓迫別國的不平等條約「立刻作廢」。一九一八年七月蘇俄人民外交委員長齊采林有一個通知送達中國，聲明蘇俄決

定放棄帝俄過去與中國訂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與因締約而享受的一切非法特權。當時北京的軍閥政府，是世界上最反動的政府之一，非常仇視蘇俄，而置人民利益於不顧，因此列寧的「和平法令」和齊采林的通知，都沒有引起反響。那時在中國人民中，由於消息被封鎖，也幾乎沒有人知道列寧的「和平法令」和齊采林的通知。就是十月革命的真相，在很長一個時期中，由於武裝干涉者截斷了中俄的聯繫，一般人也都不大了解。直到紅軍打退帝國主義干涉者之後，中國人民才得到關於俄國革命的真實消息。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又對中國人民發表了一個重要的宣言，即「蘇俄致中國國民及南北政府宣言」，宣佈取消帝俄時代奴役中國的一切秘密條約，放棄帝俄時代在華所攫奪的一切利益和特權，同時俄國蘇維埃政府主張根據絕對的平等原則，與中國建立友誼的邦交。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這時在美、英、法帝國主義唆使下，正派遣大批軍隊，開進外蒙古，進攻西伯利亞，成為十四國武裝干涉蘇俄的一員，對於蘇俄政府的宣言仍是置之不理。

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蘇俄政府又向中國重申前議，表示願以完全平等與尊重中國的利益為基礎，迅速樹立中俄兩國友誼的關係；由於北洋軍閥政府拒絕接受，也沒有得到任何結果。

但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政府想使蘇俄的正義的宣言永遠不為中國人民所知，終究是辦不到的。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兩次宣言，在中國廣大人民中發生了極深刻的影響。這時，中國人民已經從巴黎和會上認識了帝國主義的面目，因此對蘇俄政府自動放棄不平等條約及特權，莫不歡欣鼓舞。全國三十一個重要團體，通電蘇俄，表示感謝。蘇俄又主動派遣外交大員——優林、裴克斯、越飛等先後來中國提議舉行談判，解決中蘇間建立邦交的問題，雖都因北洋軍閥政府沒有誠意，未獲結果，

但更使中國人民感到興奮。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北洋軍閥政府在蘇聯的一再努力和國內輿論的責難下，才與蘇聯代表加拉罕簽定了中蘇關於解決兩國一切懸案原則的協定，建立邦交。這次協定，是中國百年來外交史上與他國按照平等原則及友誼精神所簽定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在這一時期中，列寧和斯大林領導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幫助中國工人階級完成了建立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並給了廣東革命政府許多直接的幫助。第三國際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革命高潮的基礎上，在列寧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列寧爲建立第三國際，曾進行過許多堅毅的工作。還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就由列寧發起召集了數國社會主義政黨左派代表的會議，這次會議決定召集第三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第三國際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正式成立第三國際。從此第三國際即高舉着世界革命的旗幟，成爲領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總機關。

一九二一年三月，第三國際代表馬林來到北京，他曾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成立大會），並到廣東會見了孫中山，建議他改組國民黨和建立革命軍隊。一九二二年八月，越飛來華和孫中山再談改組國民黨與建軍等問題，並表明第三國際可予幫助，得到孫中山的歡迎。在一九二三年一月時成立了有名的「孫文越飛協定」，奠定了國民黨以後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基礎。到一九二三年底和二四年初，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努力，由於共產國際的幫助，完成了國民黨的重大改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廣東革命政府更聘蘇俄的鮑羅廷爲政府最高政治顧問。後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第三國際和蘇聯人民都給了很多幫助。如果沒有十月革命後第三國際和蘇聯人民對中國的這許多幫助，一九二四——二七年的大革命是很難設想的。

四 華盛頓會議與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

與上述同一時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美、英、日爭奪中國的鬥爭更加尖銳化。

戰後的英國國內經濟凋敝，在歐洲市場上又日被排斥；爲了補償大戰中的損失，醫治戰爭的創傷，英國自己巴黎和會後積極發展遠東市場，加緊掠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在大戰中和在巴黎和會後在中國搶到的東西最多，幾乎形成了獨霸的局面，嚴重地威脅着英國在華的利益，同時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勢力也日見膨脹，因而英日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就逐漸地加深起來。這就成爲一九二一年英日同盟條約期滿後，日本還想續約而爲英國所拒絕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英國在遠東問題上（主要是中國問題上）日益倒向美國一邊並贊助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的主要原因。

然而，帝國主義在遠東的矛盾，最基本的却還是美日的矛盾。

美國是一個後起的帝國主義國家，在大戰期間，美國資本家利用戰爭和歐洲的破產發了大財，使美國主義由債務國一躍而爲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成爲戰後帝國主義陣營的霸主。大戰結束後，美國憑藉其優越的經濟勢力積極向外侵略，大量輸出資本，以掠奪殖民地，中國就成爲它最重要的目標。因此美國對日本在中國所造成的獨霸局面十分不滿，而日本又不願把自己在中國已搶到的東西輕易地吐出來，這就成爲在巴黎和會上美日矛盾不能調和的原因。由於美帝國主義在巴黎和會上，沒有達到與日本分享在華利益的目的，而且和會還承認了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地位，所以會後美日之間的矛盾就更尖銳起來。這樣美、英、日在遠東的角逐戰就日益緊張起來，各方都積極加強自己在太平洋上的軍備。美國方面是積極建設兩洋艦隊，尤其擴充和加強太平洋艦隊，英國則高唱五大無畏艦隊計

劃，日本也不示弱，喊出要建立所謂八八艦隊（即以戰鬥艦八艘，巡洋艦八艘組成之艦隊）。美、英、日在太平洋的軍備競爭，愈來愈緊張。

美、英、日等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鬥爭，也表現在中國不斷的軍閥戰爭上。扶植和利用軍閥勢力，以實現其掠奪中國的計劃，這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慣用的辦法。中國的軍閥爲了維持它對中國人民的統治，也必須以帝國主義做靠山，如段祺瑞、張作霖是日本在中國的代理人，而曹錕、吳佩孚則是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直皖戰爭、直奉戰爭等軍閥的混戰，一方面固然是各軍閥爭奪地盤、擴張自己勢力的鬥爭，另一方面又反映着帝國主義在對中國侵略中的矛盾的更加尖銳。

華盛頓會議就是在美英日這一矛盾發展的尖銳化的情勢下召開的。

華盛頓會議（即太平洋會議）是美國與日本爭奪遠東霸權的會議，由美國發起，在英國同意下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召開的。主要是由美、英、日、法、意「五強」參加。會議中所討論的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實際就只是中國問題，中國也被邀出席。荷蘭、葡萄牙、比利時因爲在中國也有一些特權，所以也是大會參加者。這樣華盛頓會議就有九國參加。

華盛頓會議的結果是在表面上暫時緩和了美、英、日之間的衝突。這首先表現在軍備限制案上，關於太平洋軍艦的噸數比率，規定美、英各爲五，日本爲三，法、意各爲一・七五。但在事實上各國軍備的競爭，並未因此而緩和下去，並更預伏了日後美、英、日之間衝突的因素。其次表現在對掠奪中國勢力範圍的劃分上，在美、英聯合進攻下，日本作了讓步，而獲得暫時的協議，這就是「九國公約」的簽訂（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九國公約」中國也簽了字，但實際上正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宰割中國的一個協議。在這個「公約」中，完全按照美國提出的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

而使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獲得了重大的發展。「九國公約」在名義上「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公約第一條），而實際上則是由美帝國主義率領英、日等帝國主義共同控制中國並爲美帝國主義獨佔中國作準備，以打消日本獨佔中國計劃。毛主席曾說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獨霸中國的機會。……一九二二年美國召集的華盛頓九國會議簽訂了一個公約，又使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由於「九國公約」的簽訂，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矛盾和衝突，得到了暫時的協調，這就加強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反革命戰線的力量，使帝國主義能够在協同行動下對付中國人民的革命，因而給中國革命增加了某些困難。

在華盛頓會議後，歐洲戰後各國的革命運動，由於缺乏工人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許多國家當時還沒有共產黨的組織），以及社會民主黨首領們的叛賣，在資產階級殘酷鎮壓下，大都失敗了。歐洲各國革命的失敗，就使世界資本主義開始渡過了戰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一個時期，而進入到資本主義暫時的局部的穩定階段。至一九二五年，資本主義世界各主要工業部門與農業的生產以及商業貿易的總指數，都差不多達到戰前的水平。這樣就在國際關係上形成了革命與反革命兩大陣營之間暫時的均勢，因而使帝國主義能够拿出更多力量來反對中國人民的革命。這個情況，就成爲中國一九二四——二七年的大革命失敗的重要客觀原因之一。

五 結 束 語

總括說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關係，正如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所指出的：

「……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後鬥爭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着，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註）高舉着，號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於其旗幟之下。」

這兩大勢力的矛盾和鬥爭以及帝國主義陣營中的互相爭奪和衝突，在遠東則都集中到中國，使中國成爲戰後東方許多矛盾鬥爭的焦點，主要地說來，一是美、英、日各帝國主義相互間激烈爭奪的焦點，一是革命和反革命激烈鬥爭的焦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的基本輪廓及其發展，大致說來，就是這樣。

註：國際聯盟是在巴黎和會上由美國總統威爾遜提議組織的。一九二〇年國際聯盟的第一次大會在威爾遜主持下於日內瓦舉行。國際聯盟以保障世界和平和保護勞工爲標榜，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國家爲了組成反蘇反革命的共同陣線，所以需要這樣的機關。由於美國和英法在處理戰後德國問題上存在着矛盾，美國的資本家們希望保持德國作爲他們的投資地和市場，所以美參院後來拒絕參加國聯，不批准巴黎和會上通過的對德和約，並於一九二一年與德國單獨媾和。但美國政府對國聯這種不合作的態度並沒有維持多久，因爲美國政府看到國聯是世界反革命的有力工具，所以一九二二年初，美國即派遣代表列席國聯會議，使國聯的活動，處於他的控制和影響之下。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中國工人階級發展的情況

劉立凱 王 真

中國最老一代的現代產業工人，是產生於外國資本在中國的企業裏。遠在中英南京條約（一八四二年）規定五口「通商」後不久，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者就在中國建立了他們的近代企業。那時資本主義經濟侵略是以商品輸出爲其主要形態，所以他們在中國首先經營的企業也是運輸商品的航業。與此相伴隨，他們在中國南方海岸的城市進行了開闢商港、建設商港市政、修建貨棧等活動。例如，當時英國資本主義侵略者曾在廣州招募華工到沿廣州、香港、澳門航行的英國輪船上去工作，同一時期，英人柯拜在黃埔建立船塢，以修理船隻。在這些企業中，出現了一批現代的中國產業工人。咸豐年間（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年）廣州出現了中國最早的搬運工人的組織——廣州打包工人聯合會。一八五八年，在反對英、法侵略軍佔領廣州城的鬥爭中，有兩萬多香港的市政工人與搬運工人罷工回廣州來。這次罷工，是中國工人反對帝國主義最早一次規模較大的罷工。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中國幾個封建官僚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創辦了一些軍火企

業。這些企業，以其所有權與經營方式來說，就是當時所說的「官辦」企業。從八十年代起，除繼續進行官辦的軍火企業外，又有「官辦」和「官商合辦」的輕工業，如繅絲、紡織、製麻、造紙、火柴、織呢等。總計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到十九世紀末，這三十多年中，即所謂「洋務運動」期中，前後所辦的企業，共有四十幾個。中國較老的一批工人，就在這些企業中發展了起來。這些企業中的技術工人一部分是從香港及廣州招來的，簡單勞動者一部分是由湘軍弁兵充任。這四十幾個企業，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的腐化，大多是時辦時停，以至完全停頓，能够延續下來的，只有十幾個。如江南造船所，福州船政局、漢陽兵工廠、開灤礦務局、招商局等等。

同一時期，帝國主義的在華企業，更有了進一步的擴展。以航業來說，英帝國主義的兩大輪船公司——太古、怡和（人們通常是以其最大的股東的原公司這樣稱乎它），就是在這個時期內成立的。太古輪船公司成立於一八六七年，怡和輪船公司成立於一八七七年。這時英帝國主義充分利用了天津條約中關於內河航行權的規定，幾乎獨霸了中國沿海及內河的航運，並用減低運費的手段來抵制中國招商局，幾乎把它擠垮。同一時期，帝國主義各國（英、法、德、意等國）還在中國非法地創立了若干新式工廠：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英人在上海設立耶松船廠，製造船舶所用的機器及修理輪船；從一八六三年起，帝俄即開始經營黑龍江漠河金礦；一八七二年，創辦上海「申報」的英人美查會兼營新式印刷工業及火柴廠；一八七八年，法商在上海設立寶昌繅絲廠，英商怡和洋行及意商也會在中國經營繅絲工業；一八八六年，德人在上海設立正裕麵粉廠。不過，這些企業，一般說來，規模是不大的，如一八六五年李鴻章在上海會收買了外人在華所辦的最大機器鐵廠，全部資產值銀還不到四萬兩。

在這同一時期，不是官辦而是中國商人自辦的企業也開始建立起來：如一八六一年，福州開辦了三個機械製茶廠；一八六二年，上海洪盛米號開始用機器碾米；一八八〇年，廣東已有了機器繅絲廠；一八八二年，上海曾有私商設立機器造紙廠等等。這些零星的私人企業，規模都很小。

總結這一時期，無論外國資本家在中國境內所辦的企業，或洋務運動中封建官僚們所辦的企業，規模與數量都是不大的，私人資本企業，更是微不足道。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在這一時期，發展也是不大的。

自十九世紀末葉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止，這一時期，世界資本主義已進到帝國主義階段，它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從以商品輸出為主轉變為以資本輸出為主；馬關條約的訂定，更給帝國主義在中國建立工廠以「合法」的保障。因此，在這一時期，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企業，除航業繼續擴張外，在鐵路建築業、礦山開採業、工廠企業三個主要企業部門都有了新的擴展。以鐵路建築業來說，一九一三年，中國境內的鐵路已有一〇、九四四公里，我國現有鐵路的若干幹線，大部分已在此時完成，這些鐵路，絕大多數是帝國主義投資所建築。以工廠企業來說，在一九一三年，帝國主義在華工廠總數達一六六個。這年中國境內的紡織廠共有紗錠九八二、八一二枚（爲一八九〇年紗錠數一一四、七一二枚的九倍），其中英、日紗錠即佔三分之一；織機九、三八九架（爲一八九〇年織機數一、六一二架的六倍），其中英、日的織機約佔一半。同年中國境內新式煤礦共二十幾個，共產煤七、五九七、五七一噸，其中年產煤在十萬噸以上的大煤礦即有十一處，這些煤礦大部爲帝國主義投資所經營。在這期間，中國民族工業也有若干發展，尤其是輕工業。如以工廠企業爲例，據那時北京政府農商部的統計，純係中國自營的有七個以上工人做工的工廠，在一九一三年有二一、七五四個，工廠工人總